

# 狂欢文本中的译者身份\*

欧阳东峰\*\*

(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23)

**摘要:** 本文借巴赫金的“狂欢文本”这一强调互文性的比喻, 讨论翻译理论一个根本问题——译者的身份和地位。文章指出兼读者、阐释者和作者三重身份为一体的译者是翻译的主体, 这一主体地位要求他除了顾及语言层面, 还应该考查原文文本在其文化中的互文参照, 激发读者在文化层面上的联想, 以服务目标语、目标文化为基准, 求得读者的认同和理解。

**关键词:** 译者; 狂欢文本; 互文性; 主体性

## Translator's Identity in the Carnivalized Text

Ouyang Dongf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2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ranslator's status and identity in the carnivalized text which is a metaphor raised by Bakhtin to highlight the intertextuality of texts. Having the identities of reader, elucidator and author in language translation, translator has the subjectivity to incorporate and compensate the intertext information on the cultural level as well as on the language one. Therefore, the fundamental manipulator can recall the readers' cultural imagination conveyed by the intertext signals and the target text can receive the ST's contribution in a real sense.

**Key words:** translator, the carnivalized text, intertextuality, subjectivity

### 一、引言

随着各种理论思潮的涌起, 翻译这门学科的很多的观念也在更新完善, 为它的生机繁荣提供契机。在语文学式的译学研究传统时代, 翻译的态度多取决于译者的自由, 当时的译论是以语文学和美学为基础的; 后来, 在比较语法和结构主义涌现时期, 翻译的态度多偏客观, 译者注重文本, 要求规范客观, 忠实原文, 将自身的位置边缘化;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以后, 后结构主义盛行, 译者以交际论、多元论、文化论为视角, 开始重视语用功能和宏观语境, 文本的作用开始减轻, 译者——这一长期以来受到忽视却一直积极的活动因素开始受到关注。很多学者提出“以译者为主体”的观点, 如哈提姆与梅森 (Hatim & Mason) 在《语篇与译者》(*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中有这样一句话 (1990: 223): ...the translator stands at the centre of this dynamic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另外, 韦努蒂和罗宾逊对此也有所提及, 但并未进行深刻讨论, 来明确译者的中心地位。在国内, 虽然少见系统性的文章, 但不断可以听到讨论这个话题的声音。如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杨武能先生就提出译者是文学翻译的主体之一, 另外的两个主体是作者和读者, 而译者处于中心的地位。2002 年袁莉在“关于翻译主体研究的构想”一文中提出译者是这个阐释循环的中心, 也是唯一的主体性要素 (袁莉, 2002: 402)。田德蓓认为译者的身份是多重的, 他既是读者、作者, 又是创造

---

\*本研究为广东工业大学 2004 年学校科研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 042009)“多元视角下文化与翻译的互动”中的“翻译与文学的互文性研究”子项目。

\*\*欧阳东峰 (1976-), 女, 湖南衡阳人, 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 翻译与文化。通讯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广东工业大学(龙洞校区)外国语学院, 邮编: 510623。E-mail: [ouyangdf@hotmail.com](mailto:ouyangdf@hotmail.com)  
Tel: 020-87562776(H)

者和研究者，并在翻译过程中融为一体，不可分离，这其实也肯定了译者主体意识的唤醒(田德蓓，2000：339)。许钧也提出，我们在定义翻译主体性时，显然要考虑到作者、读者的主体作用，但居于中心地位的，则是译者这个主体(许钧，2003：351)。无论如何，就翻译本身而言，译者无论持何观点，他的主体地位是不争的事实，因为读者只能通过译者的口吻去想象原作者表达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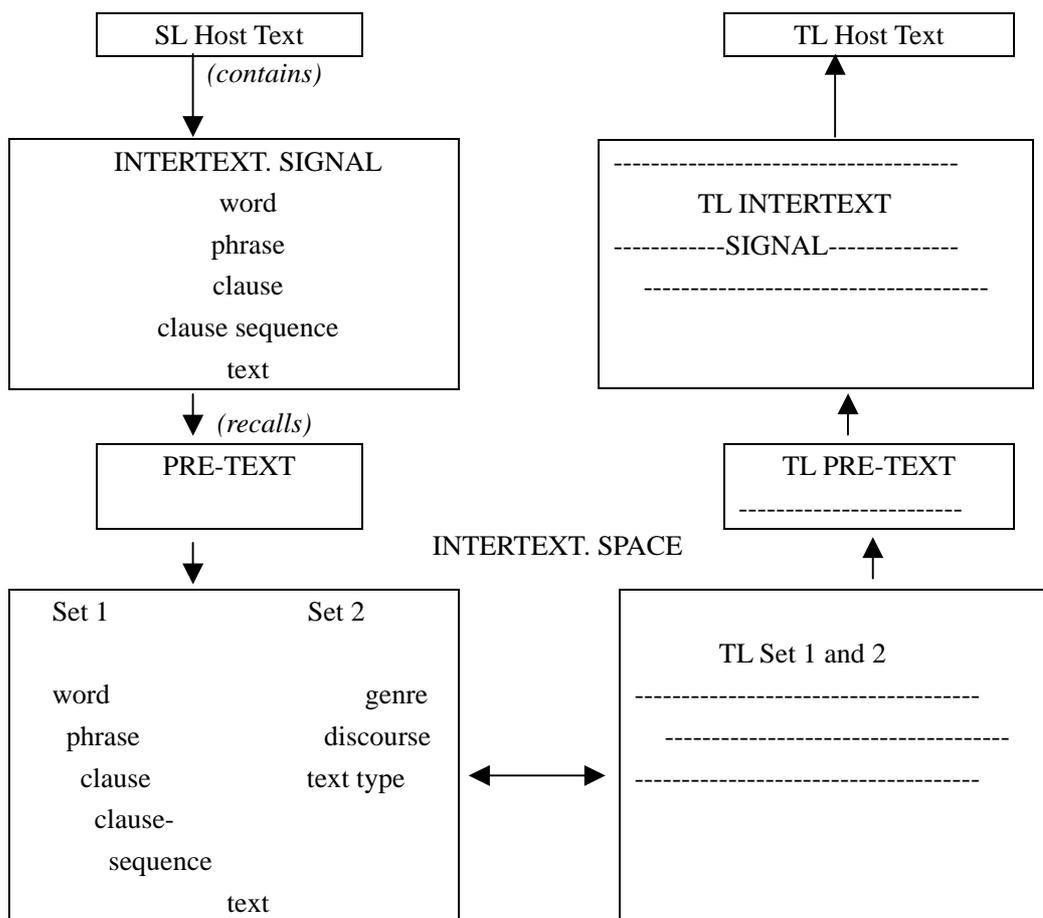
## 二、 互文性理论的启示

翻译是原语文化透过原作者和译者跨越时空与读者的对话，是巨大的文本家族里的互相关联，所以它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活动，从宏观的角度讲，原作与译作就是一种互文关系(译者的文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作品)。互文性理论是西方结构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过程中的产物，是众后现代和解构大师们经常用到的。这些学者们认为，作者不是创造者，一切的语境都是互文本，文本观念不是自主和独立的，而是开放和相互作用的。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这个概念首先是由法国的后结构主义文艺批评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在1969年的《符号学：符义解析研究》一书中提出来的。但在她之前，俄国学者巴赫金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中提出了对话、复调理论和“文学狂欢节化”(the carnivalization of literature)概念，认为陀氏小说中存在着作者和主人公的对话，是多音部的小说结构，即是由不同声音同时共存的复调结构，并体现了文学的狂欢节化，狂欢本指民间的庆典仪式，此背景下的文学狂欢化意味着无边界，无中心，打破权威，纷乱混杂，但却一符多音，相互指涉，交叉渗透，共存互动(Vieira, 1999: 107)。克里斯蒂娃受此启迪，批评了结构主义的弊病，发展了自己的理论，认为当前文本都是以先前话语的存在作为先决条件的，这种符号系统之间的互换就是互文性，每一个文本把它自己建构为一种引用语的马赛克，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化。(Kristeva, 1969: 146)这个概念使得单个文本的意义多元化，空间开放化，使得对文本内部的符号研究转向外部的关系研究。她主张文本的二维空间，即在横向上文本中的符号属于作者和读者，在纵向上它又被先前存在和同时存在的文本所限制，因而成为一个巨大的无边界的织体。单个的文本是没有意义的，文本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它们之间总是处在相互影响、重叠、转换的过程中。

这个理论被后继者大大的丰富和发展了，互文性不仅囿于单纯的文本研究，而且还发展为多视角的文化和翻译研究。斯塔姆(Stam)就补充提出除了克里斯蒂娃提出的纵横二维空间外(斯称为外互文性 extratextuality)，应该还存在一种关系，即同一文本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内互文性(intratextuality)关系，这样就出现了界定符号的第三维空间——深。这样，互文指涉可分为二类：第一类是外互文，即存在于不同文本之间；第二类是内互文，指存在于同一个文本内。这一点已被国内学者公认。此外，哈提姆与梅森还从互文性的作用将其分为积极互文性和消极互文性两种。积极互文性能引发超越文本之外的知识和价值体系，而消极互文性只是为了让文本通顺。

哈提姆与梅森在《语篇与译者》一书中第七章对互文性有较多的讨论，他们认为，互文性不仅是同一语言内或跨语言间的典故，它已扩展成为组成所有文本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互文性特征重在分析一文本对另一文本的贡献(contribution)，在互文过程中，互文性信号标志有可能产生含义上的改变。从下面这个由原文本到目标文本的互文指涉过程图(Hatim & Mason, 1990: 134)，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两位学者的思路。在这个流程图里，互文性信号标志(intertext signal)作为载体，包括词、词组、小句、句群和文本，激活了原文本的前文本。前文本由两个系统构成，一个由语言系统的成分构成：词、词组、小句和句群；另一个由符号系统的成分组成：文本、话语和语类。这两个系统跨越中间的互文空间到达目标文本，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时，都要经过这一系列的过程。



互文性理论与传统文本研究的差异主要是：前者强调读者与批评的作用，后者则以作者和文本为研究中心；前者认为文本没有最终意义，具有流动性，而后者认为文本有最终意义；前者重在文本间的互相指涉，偏重符号系统的共时结构，后者强调文本的简单来源；前者是开放性研究，后者是封闭性研究。

### 三、翻译互文活动中的译者身份

互文性理论被很好地用在了翻译活动上，因为翻译不是一个简单的单向活动，而是一种语言文化在互文性质上的转换活动。根据德里达的观点，这种互文性转换活动可以包括翻译中出现的对原作信息的补充、替换、增删甚至误读。在如今追求新思维，崇尚多元化的理念下，这一理论无疑为翻译带来了新的契机，成为一种重要的认识维度。

前苏联翻译理论家什维采尔在《翻译理论》一书中提出：“翻译不仅仅是代码的简单代换，而是从另一种文化的角度阐释原文，以便读者能够领悟。”（杨衍松，1994）原文浸润在巨大的文化网络丛中，在文本的转换过程中，处于主体地位的译者有着很大的影响作用，译者首先要读懂原文所蕴含的文化包孕和互文关联，才能避免必要信息的缺位。

从下面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有时语言层面上的逐字翻译会人为制造理解障碍：

*杭州的春天，淡妆艳抹，无不相宜。*

这里的淡妆艳抹不是指 *lightly or heavily made up*，它源于苏轼的一首咏西湖的诗《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The shimmering ripples delight the eye on sunny days; the dimming hills present a rare view in rainy haze. West Lake may be compared to Beauty Xizi at her best; beautiful whether richly

adorned or plainly dressed. 翻译该句时不能只译句中字面意义, 而应追溯其源, 在文化的网络通道里理解嵌入的参照含义, 将其译为 Sunny or rainy, Hangzhou looks its best in spring. (郭建中, 2001: 18)

根据互文性理论, 前文本和生成文本是一种互文关系, 译者处在它们的中间, 是一个兼读者、阐释者和作者三重身份为一体的角色。斯坦纳在 1975 年出版的《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中提出翻译的过程即为“阐释的过程 (the hermeneutic motion)”, 它包括: 信任(trust)、侵入 (aggression)、吸收(import)和补偿(compensation)。正因为这四步都无可避免地要牵涉到社会与文化层面的碰撞和冲突, 所以他实际上是将翻译这个问题置于社会和文化的大背景下考虑。翻译涉及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价值体现, 所以围绕此活动一定会有各方面的冲突, 如译文与原文的冲突, 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的冲突, 译者与原作者的冲突, 读者与译者的冲突。在冲突中, 必然会产生互相的侵犯, 如译者粗暴地处理原文, 在译文中掺入浓重的主观色彩等。斯坦纳认为, 我们要用智性去包围, 解剖外壳, 将内核据为己有, 如同圣哲罗姆对此的一个巧喻: 译者把意义像囚犯般抓回来。但在这个过程中, 译者往往会在“吸收”中把握不好自己, 再次失去平衡, 因此阐释活动必须给予“补偿”, 而“交流”和“平衡”就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补偿”的前提条件。正如萨特所说: 译者是在创造过程中进行揭示, 在揭示过程中进行创造。在重视语用功能和宏观语境中的译者, 作为翻译的主体, 应考查原文文本在其文化中的互文参照, 再从更高层次上把握文本, 进行阐释, 挖掘出文本背后的隐含意义, 从宏观上把握文本。

比如高路等人用互文性理论, 分析宋代词人李清照的《声声慢》里“满地黄花堆积, 憔悴损, 如今有谁堪摘?”里的“黄花”的二种译法: 许渊冲先生译的“yellow flowers”和 Kenneth Rexroth 与 John A. Turner 的“chrysanthemums”, 在中国古典文化中“黄花”和“菊花”有互文关系, 为了弥补在西方文化中“黄花”含义的缺失, 译者要进行“吸收”和“补偿”, 改译“菊花”, 以达到原诗内涵上的“平衡”, 传递了隐含意义, 西方读者才能明白。

译者对原文中互文性现象的理解有助于正确表达, 许多的西方文学批评家对文本中的这种现象相继进行了研究, 如罗兰·巴尔特, 雅克·德里达和热拉尔·热奈, 观点有二: 一是以克里斯蒂娃和巴尔特为代表的广义说, 他们认为凡是与该文本意义有关的知识代码、表意实践都是互文性的体现, 他们将文本放在巨大的文化传统背景下, 这个网络无处不渗透, 无处不影响; 一是以热奈为代表的狭义说, 他认为互文性是指一个文本与存在于此文本中的其他文本的关系。这个观点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宏观互文和微观互文, 前者指整个文本的谋篇布局的立意手法与前文本相似, 是文本间在宏观上的联系, 后者指具体的语词句子选择一致或有相关性。

最为有名的宏观互文指涉莫过于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了, 他借尤利西斯之名直指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主中公奥德修斯, 在情节结构上也与原文保持了对应和一致, 都是以寻父为始, 以全家团圆为终。在人物刻画方面, 渺小和伟大, 空虚和勇敢, 轻佻和忠贞——对立, 体现了卑劣的现实和英雄的历史之间的强烈反差, 《尤利西斯》借着《奥德赛》达到借古讽今的作用。

历史总是在不断地重复自己, 从公元前 7 世纪的古希腊推移到 1997 年, 美国又出了一个叫查尔斯·弗雷泽尔的“当代荷马”, 写出了一本美国内战版的《奥德赛》——《冷山》, 讲述一位勇士突然悟到家园与和平才是他真正想要的东西, 这位美国内战版的奥德修斯——英曼, 其与奥德修斯共同具有的精神内核就是回归故乡的渴望。该小说和《奥德赛》与《尤利西斯》一样, 都是平行的两条线: 一条是勇士执着的归家之旅; 另一条是他的妻子忠贞不渝的等待。这样的互文特征是何其惊人地相似! 译者在进行翻译创作时, 如果不能理解互文本生命在时间上的延续和在空间上的拓展, 就不能唤起它在历史中的回声, 会削弱文本的生

命力。

文学作品中的微观互文指涉有典故和原型 (allusion and archetype)、拼贴 (collage)、嘲讽的模仿 (parody)、引用 (citation) 等等, 它们成为语言转换中的“超语言因素”,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语篇的理解和交际。行文用典在文学语体中比比皆是, 它能使简单的符号承载浓厚的历史积淀, 如果译者不能捕捉到这些语源的话, 就会流失必要的讯息。篇幅有限, 我们就不一一举例示范了。那在以互文性理论的启示下, 译者有没有一个可以借鉴的参照标准呢?

清华大学的罗选民教授曾撰文就《红楼梦》书名的两种英译探讨其互文性问题, 杨宪益、戴乃迭译为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David Hawks & John Minford 则译为 *The Story of the Stone*。将两者放在民族的传统文脉背景下来看, 杨译的“红楼”表达了汉语文化中名门望族和富家女子的住处的含义, 如杜甫的“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 和李白的“东风已绿瀛洲草, 紫殿红楼觉春好”的诗句, 但忽视了西方文化的照应; 而霍译照顾了双方的文化背景, *The Story of the Stone* 更易于为西方人接受, 是因为砂石在西方文学中有深厚的隐喻意义, 英国诗人 William Black 有诗句道: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从一颗细砂看尘世, 从一朵野花观苍穹)。而且石头在中国也有很深的沉淀, 它的互文关系不胜枚举, 如精卫衔石填海, 女娲炼石补天, 这样的英译在两种文化里都有着令人满意的回响, 因此两相比较, 后者更佳。这给了译者一个很好的提示, 在翻译过程中杨译和霍译都注意了互文性, 但杨译多考虑原语文化, 而霍译兼顾了两种文化, 重视了与读者的对话, 以避免信息损耗。因此, 判断孰优孰劣的标准是看互文的传达除了顾及语言层面, 是否激发了读者在文化层面上的联想, 在这一点上它向功能主义翻译观点靠拢, 即以服务目标语、目标文化为基准, 并求得读者的认同和理解。

#### 四、结语

任何文本都必须依赖其它文本而存在, 如果脱离了与其它文本的相互作用, 就会毫无意义。这种文本的结构就象一个大狂欢节, 有众多独立的演员在共时的状态下混杂并行, 各司其职, 并达到一种复合统一, 而译者就是处在这狂欢舞台的中心位置的舞者, 是全场的亮点和最活跃的主体。国内的学者近年对这一话题也有较多谈论, 胡庚申教授在“译者主体论”的基础上, 还提出了“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观, 进一步确定了译者中心的定位。

互文性理论引入翻译领域, 带来了一种新的视角, 也给从事翻译活动的人们提出了要求: 应该保持开放性的眼光。但这个理论并不是万能的, 译者同样会遇到翻译的限度, 如果是消极内互文, 译者比较容易把握信息的指涉; 但如果是积极外互文, 则不太容易理解其义并在翻译中传达, 而且互文的承载不能超过本国文化的限度。正如闻一多所说, 翻译如同戴着镣铐跳舞, 是一门受约束的艺术, 译者的主体性也必然不是完全自由的。

## 参考文献

- [1] Hatim, B. and Mason I.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M]. London: Longman. 1990: 120-137.
- [2] Kristeva, J. *Semeiotike. Recherches pour une sémanalyse*[M]. Paris: Seuil (translated as *Desire in Language: 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 edited by L. S. Roudiez, translated by A. Jardine, T. A. Gora and L. S. Roudiez. Oxford: Blackwell). 1969: 146.
- [3] Robinson, D. *The Translator's Turn* [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 [4] Steiner, George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5] Venuti, L. *Rethinking Translation: Discourse, Subjectivity, Ideology* [M]. London: Routledge.

1992.

- [6] Vieira, Else Ribeiro Pires. Liberating Calibans: readings of Antropofagia and Haroldo de Campos' Poetics of transcreation[A]. Susan Bassnett & Harish Trivedi.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Theory and Practice*[C].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 [7] 高路 高远. “黄花” = “yellow fowers” ?[J]. 安徽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4): 83-87.
- [8] 郭建中. 实用性文章的翻译 (上) [J]. 上海科技翻译. 2001, (3): 14-20.
- [9] 胡庚申. 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 [J]. 中国翻译. 2004, (3): 10-16.
- [10] 蒋骁华. 互文性与文学翻译[J]. 中国翻译. 1998, (2): 20-25.
- [11] 罗选民. 从互文性看《红楼梦》书名的两种英译[A]. 谢天振 (主编). 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C].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174-179.
- [12] 秦文华. 在翻译文本新墨痕的字里行间[J]. 外国语. 2002, (2): 53-58.
- [13] 田德蓓. 译者的身份[A]. 谢天振(主编). 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C].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339-352.
- [14] 许钧. 翻译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 [15] 杨衍松. 互文性与翻译[J]. 中国翻译. 1994, (4): 10-13.
- [16] 袁莉. 关于翻译主体研究的构想[A]. 张柏然、许钧(主编). 面向二十一世纪的译学研究 [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397-409.